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丛书

转型期中国社会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曾永泉 / 著



ZHUANXINGQI ZHONGGUO
SHEHUI FENGXIAN YUJING
ZHIBIAO TIXI YANJIU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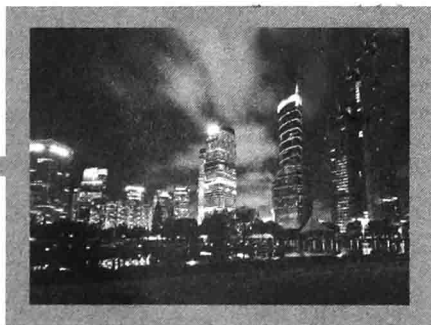
<http://www.hustp.com>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丛书

转型期中国社会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曾永泉 / 著



ZHUANXINGQI ZHONGGUO
SHEHUI FENGXIAN YUJING
ZHIBIAO TIXI YANJIU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曾永泉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80-0039-0

I. ①转… II. ①曾… III. ①社会管理-风险管理-预警系统-研究-中国 IV. ①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0220 号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曾永泉 著



策划编辑:曾光
责任编辑:胡凤娇
封面设计:龙文装帧
责任校对:封力煊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1.5
字数:223千字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



曾永泉，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博士，兼任华中师范大学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督导，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人员。自2005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长期关注社会风险预警问题，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及其干预机制研究”。主持市级部门项目一项，发表和撰写的论文及咨询报告近10篇，出版教材1本，参编教材5本。

ZHUANXINGQI ZHONGGUO
SHEHUI FENGXIAN YUJING
ZHIBIAO TIXI YANJIU

内 容 提 要

关注风险与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目前,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的威胁与挑战。加强社会风险预警,建构一套科学实用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乃是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本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建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需要从哪些理论中吸取养分,如何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指标,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择指标并确定指标的权重,如何进行风险的综合评价?总之,建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方法的应用是两大关键。基于此,本书首先研究了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基础,讨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等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中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其次,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源,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构提供现实依据。再次,提出了转型时期社会风险景象图、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的三维图,详细分析了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的时间维结构模型和逻辑维结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专家咨询法建构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最后,综合评价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状况,计算出总体风险指标值和各二级指标的风险值。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基础研究	(23)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启示	(25)
第二节 社会冲突理论及其启示	(31)
第二章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分析	(37)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内在逻辑	(39)
第二节 转型期社会风险源分析	(46)
第三节 转型期社会风险的特征	(53)
第三章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中的结构模型	(57)
第一节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中的结构模型	(59)
第二节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中的逻辑维	(61)
第三节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中的时间维	(65)
第四章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69)
第一节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71)
第二节 指标筛选方法	(72)
第三节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结构	(76)
第四节 各级指标的阐释和说明	(78)
第五章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85)
第一节 权重确定的方法	(87)
第二节 专家咨询分析	(91)

第六章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综合评价研究	(109)
第一节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无量纲化技术	(111)
第二节 社会风险预警综合评价模型	(116)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综合评价值	(117)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131)
附录 A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指标遴选 专家咨询问卷	(137)
附录 B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指标遴选 专家咨询名单	(145)
附录 C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指标权重 专家咨询问卷	(149)
附录 D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指标权重 专家咨询名单	(159)
致谢	(163)
主要参考文献	(167)

DAO LUN

导 论



（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包含多段文字，因图像分辨率低，无法准确转录。依稀可见“第一、”等字样。）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关注风险与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的威胁与挑战。如何加强社会风险预警,建构一套科学实用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乃是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 风险社会的来临:西方学者的警示

早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正在以全球规模悄悄地进行,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①。在理论大师吉登斯看来:“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②他认为,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存在着“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的潜在的全球性灾难。”^③而这些无疑让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着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

理论大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似乎越来越被社会的发展所证实。伴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不安全感却越来越强烈。现代社会带来的核能、防疫、药品、环境等问题,使得公众每天要面临许多风险。这些风险何时发生,何处发生,以何种方式发生,发生的概率等,这些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到疯牛病危机,从SARS病毒的出现到禽流感的肆虐,从恐怖主义危机到金融危机,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人类正在遭受着来自多方面、全方位的风险的威胁,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

相对而言,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简单现代化,并步入了反思性现代化的新阶段。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大多面临着简单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的双重阶段。一个基本判断是,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情形变得更为复杂,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也更为严峻。^④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又面临怎样的风险阶段呢?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毫无疑问,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问题。

(二) 转型中国社会风险: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

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着非常艰巨的社会发展目标,既要

① Ulrich Beck,《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SAGE Publications 1992,p18。

② Anthony Giddens,《Runaway world: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Routledg 2000,p1。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④ 曾永泉、夏玉珍,《转型期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又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起步比较晚,而且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因而必然是一种不均衡的转型,也必然是一种存在严重结构性障碍的转型。乌尔里希·贝克就曾形象地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①因为它是以历史浓缩的形式,把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一并展现出来,因此很有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我国社会学家郑杭生也指出,由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现代性全球化与我国社会转型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使我们时代的生活进入了一个不断产生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发展时期,使各种社会矛盾具有了以往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的特点和趋势,使各种社会失谐因素、各种社会矛盾有了更容易被激活、更易于被激化的结构性平台。^②这一诊断无疑敲响了社会警钟,警示我们应当重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

的确,在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风险不断涌现,使中国进入了风险和不和谐因素的活跃期与多发期,并为社会大众所感知,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根据我国权威的社会蓝皮书研究,我国自1979—2004年以来的26年间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其中,社会秩序是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4项指标组成的,26年年均递减1.7%;社会稳定指数是由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贫困人口比重、贫富差距等5个指标组成的,26年年均递减1.1%。研究指出,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③

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风险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屡禁不止的煤矿生产事故、SARS危机、食品中毒、环境污染事件等,一次次重大灾难与事故震撼着国人。仅2008年全国就相继发生了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山东淄博发生列车相撞事故、“5·12”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等严重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5·12”汶川大地震,死伤人数之多,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2009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了197人死亡,1786人受伤,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④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暴发的集中表现,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并逐年增

^①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② 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走向更加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④ <http://news.163.com/09/0805/22/5G05GIT2000120GU.html>。

多,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员越来越复杂,行为方式越来越激烈。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2006年的河北定州事件和池州事件,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山西吕梁煤矿群体性事件等,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如此种种,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进入高风险时代。如果说中国已是一个风险社会,这个说法无疑有夸张不实之嫌,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社会的风险特征已露端倪了。

(三)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必要的工作反思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中心的论题是,“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怎样以一种社会性的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①也就是说,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与匮乏做斗争,争取把蛋糕做大并合法分配。而进入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则是“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和危害怎样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导?”^②也就是说,在风险社会,人们关注的焦点是风险治理,注重于加强风险预警,或使风险得以避免,或使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也是任何一个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或民族都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风险治理,尤其是自2003年“非典”之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理突发风险事件的应急预案和规章制度。200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我国政府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基本框架和运行规范。^③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了各项专项应急预案,包括国家自然灾害救助、防汛抗旱、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突发环境事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④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⑤ 按照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各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分别制定了各种地方应急预案。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风险预警与现实需要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应急,轻预警。我国传统风险管理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侧重事后处理、忽视事前预防。不注重社会风险的识别、评价和提前预警,也缺乏一个系统的社

①② Ulrich Beck,《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SAGE Publications 1992,p19,p21。

③ http://www.gov.cn/yjgl/2005-08/07/content_21048.htm。

④ http://www.gov.cn/yjgl/2006-01/11/content_21049.htm。

⑤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3.htm。

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及预警系统。这种管理模式错失了将风险消灭在萌芽阶段的大好机会,使得风险因素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不断积累进而转化成公共危机,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其二,单兵作战,协同不足。过去我国一直采用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救援体制和危机管理模式,缺乏常设性的风险管理综合协调机构,各部门都在建立各自系统的风险监测和防控体系,但内部条块分割,相互之间缺乏信息沟通,甚至出现瞒报、谎报、漏报信息等情况,难以对风险进行全面的监测和预警。因现代风险具有结构性、全球性、多重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期性等特征,这种分散的风险预警机制显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风险治理的需要。

其三,重视传统风险,忽视现代风险。目前的风险预警和管理,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传统领域,而对于现代风险,如失业、贫富分化、生态失衡、人口结构失衡、群体性事件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心态的失衡,如诚信、仇富、自杀等风险,则明显关注不足。此外,面对风险社会的来临,一些高新技术风险,如核心风险、基因风险、信息风险、网络风险等更需要加大关注。

其四,关于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明显不足,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基于上述各种情况,我国目前对社会风险的识别、指标体系的建构、科学评价方法的应用、风险信息的收集及预警机制的建立等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研究非常薄弱。至今尚没有看到系统的有关社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的研究,少数涉及指标体系的研究停留在理论建构方面,缺乏实际应用能力和价值。

(四)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课题

社会主义社会是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更加注重和谐的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之一就是使“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主要内容,强调“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也明确指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在学术界,和谐社会的研究也成为焦点。郑杭生指出,“社会和谐是现代性过程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焦点、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①

从风险的角度看,任何和谐都是认识、规避和排除风险的和谐。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风险的超稳定结构的社会,而是呈现出风险与和谐的二元张力。缓

^① 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和社会结构性张力,规避各种社会风险,加强社会风险预警乃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旨。事实上,党中央也多次强调要加强风险预警,早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指出,要“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 risk 的能力”。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完善社会稳定的预警体系和应急处理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社会风险预警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建构一套科学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笔者认为,只有建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才能适时监控社会风险的发展状态,及时发布各种社会风险警情,尤其是及时发布那些重大社会风险警报,从而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并动员社会力量将风险控制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由此可见,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书在国内外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分析转型期的重大社会风险源,探讨指标体系建构的结构模型,并依据科学方法建构一套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将指标体系应用在转型期社会风险的综合评价中,既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社会管理实践的当务之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蒙德·鲍尔的《社会指标》一书引发了运用指标从事社会预警研究的热潮,人们开始建立各种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其中有许多与社会风险相关的指标体系。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取得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纵观其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 早期经济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

早期建立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一方面是因为各国都比较强调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在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年代更加重视的是经济风险的预警;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学中相对成熟的定量研究传统有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哈佛景气动向指数、美国商务部当时计算的先行指数以及日本政府企划厅提出的景气动向指数。

2. 综合性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观的演进,人们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开始反思片面经济增长观的不足,并促使西方学者开始在更广泛的视野中探讨风险预警问题,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也就逐渐扩展到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生态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系列综合性的有关社会风险预警的指标体系。

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的代表是美国学者埃·蒂里阿基安。1961年,他提出了测量社会动荡来临的3个经验指标:①都市化程度的增长;②性的混乱及其扩张,以及对其社会限制的丧失;③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这些指标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1976年,艾斯特斯和莫根提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不稳定性程度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来估量:①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②个人需求水平;③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④政治稳定性程度;⑤家庭结构;⑥文化势力。^①艾斯特斯和莫根提出的这6个方面比较广泛地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缺乏具体的校准度量。后来,为了进一步说明社会不稳定的程度,艾斯特斯又确定了社会不稳定性最严重的6项指标:①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②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③社会资源日趋贫乏;④政治动荡不安;⑤家庭结构处于崩溃状态;⑥传统文化力量处于崩溃状态。^②以上几个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指标运动中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缺陷,如有部分指标抽象程度过高或过于宽泛,导致其量化指标难以获得,与具体的实践应用存在一定距离,但其中的一些指标设计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预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美国外资政策研究所提出了政治体系稳定指数,具体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经济特征指数与政治过程指数3个指数,各指数评分时各占1/3,成为美国综合性社会预警的重要参考依据。罗伯特·达尔提出了衡量社会稳定状况的4大指标:①冲突的弥漫性(涉及广度,即每十万人中的参与人数);②冲突的剧烈程度(冲突中的伤亡人数);③冲突的持续性;④冲突总量。^③1989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建立了“国家危机程度指数”,这个指数包括国家信念的吸引力、社会心理情绪、人民生活水平、执政党士气、宗教活动、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矛盾、经济私有化、政治反对派活动、政治多元化、人权问题等10个方面,运用这一指标成功地对东欧剧变进行了预警。^④相对而言,以上几个指标体系的操作性更强,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社会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将社会风险预警的视野又拓展到生态环境系统。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认

① Richard J. Estes, John S. Morgan, 《World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A Theoretical Model》,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1976, 19(2): p3-15. [美]理查德·J. 艾斯特斯,《各国社会进程》,何天详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 Richard J. Estes, 《The Social Progress of Nations》,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③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④ 转引自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对国内外社会预警理论的讨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为有机农药的无节制使用将会威胁人类生存,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生态风险的思考,《寂静的春天》由此也成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文献。1972年,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未来学派,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高速运算,建立了一个能够涵盖人口、环境、经济发展、教育、能源、水源、原料、食品、卫生、就业、城市条件、居住环境等12个要素的综合社会风险预警研究模型,并模拟了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预测世界系统将会因为资源危机而崩溃,增长很可能在2100年停止,最迟在21世纪内一定会停止。《增长的极限》因其振聋发聩的警告,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发展模式的反思,成为社会预警研究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热潮。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从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入手进行社会预警。英国区域社会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罗德里克·齐舒姆在《区域预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预警的一个指标框架,总结了人口、资源、城市、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经验数据。

3. 全球化视角下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及其治理理论兴起,促使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对社会预警的进一步重视,社会预警不再只是区域或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社会面临共同威胁时的明智之举。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讨论了社会融合、减少贫困和扩大就业等共同议题。1998年,联合国开发署召开了走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会议,对社会风险的预警进行了研究。1999年,鲍勃·杰索普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一文,批评了现代公共政策正在逐渐失去预警效力,认为国家与社会、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责任界限越来越模糊,导致宏观的社会预警对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也进一步降低。^①

跨入21世纪,世界银行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对自然、健康、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6个方面的风险进行了分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全球风险警报体系。^②2000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千年峰会上,世界上189个国家一致通过了一份包含8个具体发展目标的千年宣言,包括:消除绝对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性别平等和提升妇女权利,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母亲健康状况,控制HIV/AIDS、疟疾及其他传染病,提高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及发展全球合作。在8个目标之下又包括18个子目标和48项具体指标,用以衡量和监测千年目标的实现情况。

^① 转引自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对国内外社会预警理论的讨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②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目前,全球有很多机构都在提供风险预警指标,西方一些著名的预警机构还定期对外发布其风险预警结果。如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建立了国际国家风险指南的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政治风险指数: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概况、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事政治、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律和秩序、种族关系紧张、民主问责制和官僚主义质量。

(2) 金融风险指数:总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外债服务占货物及服务出口的百分比、经常账占货物及服务出口的百分比、净国际流动资金中进口支付的月份和汇率稳定性的百分比变化。

(3) 经济风险指数:人均 GDP、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年通货膨胀率、建设余额占本地生产率总值的百分比、经常账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国际国家风险指南的预警结果被称为“其他评级可以参考的标准”,其用户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许多其他国际机构。《欧洲货币》的国家风险指数表衡量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债务指标、债务违约或重新安排的债务情况、信贷评级、获得银行融资的能力、获得短期融资的能力、进入资本市场的能力、没收贴现等 9 项内容,所占权重分别为 25%、25%、10%、10%、10%、5%、5%、5%、5%。美国传统基金会于 1973 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华尔街日报》认为该机构制订的经济自由风险指标体系的预警结果说明了各国之间繁荣差异之所在。该指标体系包括贸易政策、政府财政负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国外投资、银行业和金融业、工资和价格、财产权、规则(管制)、黑市活动等 10 个方面,各占 10% 的权重。《机构投资者》的国家信用风险预警和评级来源于对各大国际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调查而得到的一个定性指标,自 1979 年以来,其评级结果就通过期刊及公司网站对外发布。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透明国际组织,自称是世界领先的、非政府组织的反腐败机构,其腐败风险指数受到媒体和商界的欢迎。

纵观当代西方世界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在研究领域上,国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演进趋势,即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及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并在全球化视角中不断融合;

(2) 在研究视角上,逐步从单一视角走向综合,从起初的经济学研究,到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3) 在研究方法上,逐步从最初的定性分析发展到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广泛应用现代系统科学、数学及社会调查方法,可操作性不断增强;

(4) 在研究主体上,形成了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等联合参与协同作战的格局;

(5) 在研究影响上,既有理论积累,也有实践贡献,应用相当广泛,产生了深远